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一种关注

在电影《江湖儿女》里——

贾樟柯的每一笔都靠赵涛凝聚

俞露儿



在《江湖儿女》里，贾樟柯写时代的起伏，写城市的巨变，他的每一笔，都靠赵涛凝聚。赵涛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她的表演，减弱贾樟柯作品里惯常的符号气质，从而减弱影片的图解感和游离感。她是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的演员，因为对她，贾樟柯电影里那份过于便捷的“魔幻现实主义”都看起来不那么刺目了。

2018年9月21日，赵涛主演的贾樟柯作品《江湖儿女》公映。

赵涛，这位四十岁的山西女演员，在从北京舞蹈学院的民族舞专业毕业后的1998年，选择了回到山西太原。在那里，她遇到贾樟柯，继而从《站台》开始，《任逍遥》《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山河故人》……一路奔袭。成为“尹瑞娟”“巧巧”“赵小桃”等等之后，在《江湖儿女》这部辗转7700公里，同样是奔袭完成的电影背后，“巧巧”（赵涛）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是个简单明了的故事：当年大

同的大哥斌斌被其女友巧巧所救，且巧巧为其坐牢五年。但出来后，失去“江湖”的斌斌放弃依旧执着的巧巧，而巧巧在踏上自己的“江湖”之后，仍然收留了偏瘫的斌斌，最后接受他再次离开。

用十几年，写曾勾留其间的“江湖”，写时代的起伏，写城市的巨变，写总想触碰却缩回手的宇宙观，贾樟柯的每一笔，都靠赵涛凝聚。

赵涛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她的表演，减弱贾樟柯惯常的符号气质，从而减弱影片的图解感和游离感——但

凡贾樟柯电影中成功的演员，起到的概不是化腐朽为神奇，而是化小聪明为神奇的功能。

符号这东西，再隐晦复杂、想象奇观，也是显而易见、甚至苍白笨拙的，不过是概念先行，譬如《江湖儿女》中依旧难以按捺的UFO和葬礼上的国标舞。而从人物看哲学，才是作者电影的上坡路。好在贾樟柯没有失去对人和对生活流的兴趣；好在有赵涛低头弯腰，笃劲向前。

7700公里奔袭出的，是一张意义之网。

斌斌以为的江湖，是欲望满足之后所获取的个人意义感。他的失落和自以为的悲剧，其实只是庸人的狂妄。而巧巧是日渐把自己看小，她渐渐地不以为失败是失败，是因为看到了真正残酷的东西：自己只不过在永远无解的伤口上奔袭。

人都是悬挂在自己编织出来的意义之网上的生物。

从人本底色来看，《江湖儿女》的中下层“儿女”之间的矛盾，并非是巧巧和斌斌的情变，而是他们彼此编织出的“意义”之间的疏离。

斌哥在大同的生涯，离开大同的生涯，回到大同的生涯，都在他自我编织出的一张“江湖”的网上勾连。一言蔽之，斌斌靠当大哥获得意义感。“江湖”在电影里是一个必然的利益群体，在文化上被过度解读。对斌斌来说，“江湖”是他吐出的一条条丝线，经纬编织，上面闪现着他的欲望与满足之后所能获取的个人意义感。斌斌相猴群中竞争猴王，二者只有长毛和不长毛的区别。全片始终，斌斌以他有限的智慧和勇气，把自己挂在这张网上，然后随网沉浮。

斌斌的意义感之源从来不是守卫江湖规则，自然也不可能对情义有什么本质认识，他要的甚至不只是钱，他要自己坐在“江湖”这张网上发亮，要自己的网中黏附猎物，要在男人们合谋出的权力结构中找到位置。他是庸人集体的一个抽象；没有更好，没有更好，千人一面。

而巧巧，自一开始给自己编织的

意义之网就是一个“母亲”的图腾。虽然不是江湖中人，但她有很强的“领地”意识，有反射性的护卫本能。她像照顾儿子一样地照顾父亲，并且积极地跟斌斌提出结婚生子。虽然在大哥身边动荡，但她的筑巢本能无处不在；她之所以会救下斌斌以及入狱背锅，与其说是一种牺牲，不如说是她早已为自己预设好的意义果实。

这一意义，她需要，大过于他需要。因为她也有她的意义之网——她的巢穴、她巢穴里的男人和子嗣。而此后绵延出的7700公里射线，不过是一条从纯真的母亲，到沧桑母亲的心路。赵涛出演的“巧巧”，与其说是“有情有义”，不如说是“失子母亲”的执念。她们习惯用保护别人来保护自己，然后难免被生活釜底抽薪，抛回到她自己的生活轨道中去。

在影片的后半段的特写镜头里，坐着轮椅的斌斌问及“你恨不恨我”，当巧巧合着双眼说出“无情了，也就不恨了”时，由赵涛抖动的眼睑切开了一种浓重的孤独感——

斌斌一直把巧巧的感情理解为男女爱情，他本人只是个简单的负心汉。而对巧巧来说，斌斌的自私和软弱，

却是对她整张网的捣毁，使她这张网上，沾不到任何一只带来意义的飞蛾。斌斌把自己看得很大，然后失落于江湖不再，无人承接，并以此作为悲剧，其实只是庸人的狂妄。而巧巧，大概是日渐把自己看小，然后姑且活着。贾樟柯想在作品中表达的小人物之矛盾，如此看来，莫过于个人之网与生活之网、时间之网、命运之网之间不自量力的对话。

至于火山灰之意象，不过人人都是灰烬，大部分不自知，而小部分自知罢了。像斌斌这样从火山灰只联想到炮灰的，则是更执拗的一种不自知。他自以为的失败，也只因智识不够。倘若命运未对他特别表示垂青，他就草率地理解为了对他格外残酷。而巧巧渐渐地不以为失败是失败，大概是她看到了真正残酷的东西：自己只不过在永远无解的伤口上奔袭。无人可恨，无从可恨。

《江湖儿女》是因有了赵涛，才使得这场以女性视角切开的漫游，既没有沦为对江湖湮灭的讨论，也没有沦为对女性主义的歌颂。赵涛的表演传递出一种导演和演员共同凝练出的悲悯意识，这一悲悯感是越过女性主义范畴的，与人，与文化、甚至与信仰有关。

斌斌的意义之网，是创作者在男性叙事视角下搭建的权力结构，他所信奉的成王败寇，跳不出物质和荷尔蒙的双重激励。精神属性和浪漫主义都是子虚乌有。

巧巧代表着很大一部分的“直女叙事”，她们耽溺于情感结构及自我感动。她们看似挺身而出，但坚持的并非江湖之“义”，而是内心意义感的外延。

本质上，二者殊途同归，都通向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

目前大量的评价都把巧巧理解为贾樟柯对女性的一种赞扬——江湖不再，大哥式微，女性反倒侠肝义胆。照我看，从赵涛的表演以及贾樟柯对赵涛的表演控制来看，不见得。

赵涛在全片中的表现，应该说是越来越中性、越来越复杂。从告别厂区，和斌哥作伴，到出狱后去奉先问话，再到一路在漂泊中接受人生，最终回到棋牌室，她就是像每一个识穿生活真相，但无可奈何地活下去的小

人物一样，不哭不闹地活下去。

她的意义之网，在被生活一次次捣毁之后，在断壁残垣间重新编织。赵涛身上由此而产生层次，传递出一种导演和演员共同凝练出的悲悯意识，这一悲悯感是越过女性主义范畴的，是与人，与文化、甚至与信仰有关的——

众生皆苦。斌斌之苦，是想爬高却跌落，高高低低，总归是二维移动。巧巧之苦，是不得不看穿，看穿之后但又能如何的虚无之苦。前种苦难受累于“面子”，却未必具备尊严。后者则是受自我拖累的苦，刀刀磨在心上，和毛姆的《人性的枷锁》里的菲利普同源。

赵涛做得很好：当她的人生智慧尚且稀薄的时候，当她被女性本能摆布着去筑巢的时候，她会做出去奉先的小旅馆和斌斌对质的事。她必须要经历想要、要不到、看到、再迷茫的痛苦过程，并且沉住气地一一体验和表现出来。她用体验派演员的天赋替

人们揭开：女性的情感需求如果不进化到一个更复杂的状态，就必然和自己的需求之物（男人）的需求之间产生矛盾。

生活从来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分出哪个伤害略轻，就是所谓的“成长”。所以赵涛说着“无情”的时候，依然是展示伤口的无奈之举，若能再期进化，也许会哪天从伤口里开出一朵花。

能让贾樟柯的UFO（过于便捷的“魔幻现实主义”）都不那么刺目的演员，就是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的演员。《江湖儿女》，正是因有了赵涛，才使得这场以女性视角切开的漫游，既没有沦为对江湖湮灭的讨论，也没有沦为对女性主义的歌颂，而是生长出一条细长的小路。

这条路，有如生命的裂缝，而赵涛，成为与符号无关的一道伤口。7700公里的奔袭，有苦劳，有功劳。最大的功劳，在于演示渺小和伤痕。

（作者为影视编剧）



经典重读

《汉乐府》里，最简单的话承载着最深的情意

相隔万里，哪怕沟通错位 家书依然抵万金

萧牧之

身处即时通讯工具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人已无法想象信息传递不便的古代场景。古装影视中近乎万能的飞鸽传书，就是折衷现实生活与故事背景的产物。且不说古代，二三十年前的邮政通信，也已成了智能手机时代的清新怀旧素材来源——“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样的句式在转发中流传，却模糊了多少年来那些一生都在苦苦等待家书的身影。

按宋人所编《乐府诗集》，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属《相和歌辞·瑟调曲》。《文选》说是古辞，《玉台新咏》著作蔡邕。《文选》五臣注认为，长城“其下有泉窟，可以饮马。征人路出于此而伤悲矣”，乃是此诗本意。战国秦汉以来，骑兵通常是精锐。征人有马可饮，可能是骑兵，可能负责的是辎重，甚至可能是军官。后人思夫，故作是行，或许如此。但全诗没有一点有关征伐或徭役的暗示，于是后世读者乍一见之，和大部分的游子思妇诗，也没什么明显分别。可以说，这个作品的主题非常含蓄，也因此能引起更广泛的共鸣。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

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

这八句诗，连续四组自我开解，实际上，是连续四个“那又有什么办法呀”——我思念着一个人，他在很远的地方，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时时要梦见他。梦见了又怎么样呢？醒来他就消失了，他呀还是在那么远的地方，有什么办法呢？想要随时见到我惦记的人，真是很难的事情……大时代中的普通人，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只不过有人接受、有人不服。这个抒情女主人公，就特别“懂事”，也让人心疼。接下来的话，则让人心里咯噔一下：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上句并不单纯是桑叶枯萎让人知道四时变化的意思，它还有一个联想方向，是要和“树欲静而风不止”“高树多悲风”之类参照起来看的。像桑这样的阔叶树，当有叶子的时候，稍微有点微风，就会发出各种窸窣窸窣的声音，“知天风”是很容易的。叶子凋落时要是来了场风，就可能卷着叶子满天乱飞，在有心事的人眼中，会显得特别无助。那些叶子落尽的树，给人的印象是伫立在寒风中

动也不动，轮廓鲜明的深色线条直指苍天，看起来特别坚强。抒情女主人公这句，是拿落尽了叶子的树作喻体。下句是“海水知天寒”——除非天气极端恶劣，中低纬度地区海水通常是不冻的。这两个意象，都像是休眠火山，两句十字，藏下了多少不甘、多少执着。

这时候，终于有位好心人，捎来了她良人的消息：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家书如一根“救命稻草”，见着了，整个人立马就活过来了。她忙忙地打开书信，甚至不一定来得及向客人致谢：

长跪读素书，其中意何如？

地理的阻隔，导致这对夫妇客观上位于不同的时空，关心的重点会渐趋不同，相隔万里，时间久了游子连方言也未必讲得还那么利落。

汉晋时代，因为通信不方便导致的沟通错位，绝不仅只一例，也绝不仅仅在夫妇之间。

以“投笔从戎”著称的班超，几乎终汉章帝一朝，都忙于平定西域叛乱以及北匈奴的战事，他那位以学问为人称道的兄长，当时居住洛阳，寄去的家书，话题就几乎完全在状况外，时不时地还送去一些财帛，说是世交亲戚托他代购贵霜帝国的挂毯、名马和奇香。西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进入白热化，陆机统兵攻打洛阳，他的弟弟陆云在他遭受阵亡数万的重重大挫折时，忙着给他寄作品求指正，兄长不还则表示特别惆怅。这是受制于信息传递技术和沟通效率，所无法避免的荒诞情境。

兄弟犹然如此。何况夫妇之间，还有更加微妙的心思？譬如古诗《客从远方来》，全诗十句，叙事只有两句，其他都是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温柔的自言自语。“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但其实寄信人不一定希望这千里迢迢送给爱人的绸料变成可能总也用不着的双人被，说不定像后来陶渊明《闲情赋》所说的，“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只不过这故事里即便误会也是快乐的。

《饮马长城窟行》中，那封家书的内容却很简单：

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

“努力加餐饭”这样的话，古诗《行行重行行》的抒情女主人公，自己也说出来了。保重身体，吃饱吃好，等到相见的那天。但这里的语境，却不同。这是最简单的话，也是最容易引起误会的话：一句“你”，一句“我”；一句“我”对“你”的关心，一句“你”对“我”的担心。

写信的人聪慧缜密，关怀在无声处。她的故事和诗，也就到此为止。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

下图为张大千所绘《仕女图》

